

## 給劉景芳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楊尚灼

从相二王福貞同學訪問您的談話中，我了解到有幾點關於我個人的事：1) 您說，我不會解方程式，沒有才華，工資不應比您高；2) 您說我是“紅人”，是“買辦”，“政客”。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吧？我們倆都是舊知識分子，在舊社會中，我們將怎樣來解決這種矛盾呢？我想不外以下幾種方式：

1) 我們互相破口大罵，甚至扭打一場；  
2) 我也背地裏以同等的話，回敬您一番；  
3) 從此絕交，不再接談；4) 懷恨在心，乘機報復。這都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文人處世的方法，對於我們今天的工作和事業，有極大的危害性。比如說，我們如果真的扭打一場，我們的同學會怎樣說呢？更壞的是，如果同學也學我們的壞樣，他們將會以什麼方式去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呢？如果我們互不接談，將來我們怎能坐在一起，討論院務，研究教學計劃，改進教學呢？所以這些方式都不能用。只有採取社會主義社會解決矛盾的方法，那就是和您說理，達到最後團結的目的，這就是我寫這封信的動機。

先談第一個問題，——我不會解方程式，沒有才華，……。我不知劉先生是根據我請教過您的事實而下的斷語，還是根據別人說的？現在分別來談：我記得我只請教過您一次，那是1953年，我發現采利柯夫軋鋼機中兩個公式有錯誤，我把這兩個公式之間的过程都推算出來了，證明原書是錯的，想對同學說明，（因為我不能把錯的說成對的）並向作者提意見。因為這關係到國際間問題，不能不慎重，所以請劉先生審查，我的計算有無錯誤。承您費神看過，並回我一個條子，說我的計算正確。後來提到蘇聯去，作者回信也認為正確。那麼您上面所指的大約不是這回事吧？

另外可能是×××先生告訴您，我不會解方程式，當然他不會詳細告訴您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是這回事，那也是1953年，而且也是上面所引那本書上的一個機械設計公式。這個公式沒有推導过程，作為一個教師，應該把推導过程搞清楚，否則他怎麼能判斷這公式對不

對呢？（上面請教過您的那兩個方程式也是根據這個精神才找出它的錯誤來的，如果照書行事，那就不會發現問題。）這個公式包括力學，材料力學，機械設計方法等，我自己在推導过程中是遭遇着一些困難，因為這不是從頭至尾解一題目，而是從尾推到头，把一切原來得出這個公式的條件都推測出來。我請教過這位×××先生，但他沒能給我什麼幫助，還是我自己推導出來的。如您不信，可以三面對証，這位×××先生至今還推導不出這個公式，而我可以。

可能劉先生所指不是這兩回事，如果劉先生能指出其他事實，我一定虛心地檢查自己。可能劉先生指的是我教學水平不夠高。作為一個工程師，我的教學水平只到微分方程，在應用方面還沒有發現不夠用，但說到高那是遠不夠高的，我應該多多向劉先生學習。

是不是這樣就算沒有才華，不能和劉先生比較呢？我十分尊敬劉先生數學水平很高，但是在冶金工程方向，劉先生也比我高呢？我曾參與雲南鋼鐵廠的設計施工的主要工作，這個廠現在還在發揮它的作用。我能分析現代鋼鐵廠中生產問題，提出改進計劃，有研究工作為証。我能培養出祖國需要的合格的壓力加工工程師，有畢業生為証。難道這些就算不了什麼嗎？劉先生考慮工資問題的時候未免只看到自己的長處，而無視別人的長處吧？

劉先生可能說，這麼說“您也不能比我工資高呀？”這個不能完全由我們來定。但組織上這麼排，不是沒有理由的。鋼院教授的等級是由高教部控制，要和外校平衡的，如果某人不够某一級，是不能排上去的。至於我個人，我認為作為一個人民教師，應該多想想怎樣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不要只知道在工資待遇上轉念頭，更不該因此而鬧情緒，對黨對領導不滿。我不是只會說風涼話，我可用行動來證明，去年工資改革時，我曾請求領導把我排低一

上光榮。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您說我是“紅人”，“買辦”……。 “紅人”的說法，是您個人的觀點，我不必過問。至於靠近黨的話，那又有什么不對呢？問題是您以為靠近黨的人都是“吹牛拍馬，無才無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這和國民黨有何區別？這還能領導人民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嗎？恐怕這還是您只看見自己的才德，看不見別人的才德。只知抬高自己，不惜打擊別人的老思想在作祟吧？

至於說我是“買辦”、“政客”，您有何事實根據？我一生只從事過兩種職業，工程師和教師。沒有作過“買辦”或“政客”。我估計這個謠言不是您造的，而是前面所說那位×××先生捏造出來的。這個謠言在肅反時已批評過了，不料劉先生今天還來傳佈這種無踪無影的謠言。

也可能這是劉先生自己創造出來的定義，說凡是在前資委會作過工程師的，就該算作“政客”，而在香港作過教師的就該算“買辦”。這樣來把“買辦”、“政客”的定義擴大化，劉先生是可以有這樣的自由。但這和我們普通一班人所了解的定義不同，普通人認為替帝國主義資本家作走狗，不知有祖國的人是“買辦”，而替軍閥與國民黨反動派作走狗，不務正業的是“政客”。這兩種定義區別很大，不能混為一談。劉先生有責任把自創的定義向同學說明，不能混同同學。

我再一次申明，雖然劉先生背地裏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我並無懷恨之意，只想說明事實，希望互相諒解達到團結的目的，以便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劉先生，我誠懇地等待您伸出友誼之手，讓我們握着手“大笑一場或者大哭一場吧！”（最後這句話是劉先生的話，我認為說得很好，引用于此不敢掠美。）此致  
敬禮

## 劉景芳思想的外殼與內核

民盟盟員 喬丕成

中國一句老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如果把反社會主義理解為小人的話，就可以倒過來，說成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解釋一下，就是拿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尺度，量一量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

以下再談劉先生的思想，劉先生得意的公式是：“大膽的假設和敢作敢為”，這從他的發言和文章中暴露得“淋漓盡致”，如：“主宗官，傳教務長參加教研組會議就是監視，院長問教研組情況就是叫他當耳報神，咱們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更不用提，人家咋能服氣，捧幾個听话的和咱們一齊，也好壯壯胆子”等等。從上面這些話看起來，底蘊是大膽的假設，因為事實既無，設的說法，就都是“假象”。談到敢作敢為，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英勇鬥爭，倒是為了搞垮社會主義而逞英雄。從大家說過的可以證明這句話。

劉先生的言論和表現都是他思想的外殼，一切這些總有個什麼東西在主導着他，使他平日大鬧情緒，腹脹生氣（他太太陳德滋說的）。我不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歷史和此生受了什麼影響。但我可以以這幾年共事的机会，觀察到他遇事不能和黨及領導平心靜氣的“和衷共濟”。為什麼你恨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難道能以肅反有問題而得到解釋嗎？你的級評得低了嗎？官不大了嗎？我敢說就是在名譽地位上一切都滿足了你，照你所說給個部長做做，還是不滿意。章伯鈞、羅隆基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從我已知的一些小事情上，我知道他遇到名利總是爭。為他愛人爭講師。遇到學生的利益他不爭，倒是堅持不讓學生多得一次補考的机会（見一次會議，在魏教務長家）。

碰到他家的事總讓人低頭服從他。辦不到就生氣。從以上各種現象分析分析是什麼實質——思想的內核。我認為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霸道思想。

資產階級雖然是唯利是圖、還講點民主、自由。他唯利是不放棄的，這一點倒是資產階級的本質。但他不是和氣生財，在法律前平

## 我院熱烈慶祝“七一” 王維綱同志來校作報告

昨日，同學們怀着激動的心情，來熱烈慶祝自己親愛的領導者，組織者——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六周年的生日。

許多班級開了會，他們邀請了在去年歲月中，參加艱苦鬥爭的老幹部班的同學，共同度過了有意義的一天。

晚上八點半鐘，西飯廳擠滿了人群，人們怀着崇敬的心情，听了中共中央監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青年報刊載“越獄記”主人公王維綱同志所作的革命故事報告。

王維綱同志生動的敘述了兩次被捕入獄後逃跑的經過。他說：在1931年內戰時期國民黨白色統治下，宣傳共產主義是犯罪的，無數共產黨人拋頭顱、洒熱血，前撲後繼，領導群眾鬥爭。接着王維綱同志風趣地說：他當時還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因為他是河北某校的一個小學校長。但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當地工人罷工。在一次遊行示威後被逮捕，但過了不久，巧妙地又跑了出來。王維綱同志講到這里，加重了語氣說：“共產黨人在敵人面前是一個嚴重考驗，必須要有堅定的立場”。“為了充分發動群眾，黨仍派他回原地領導鬥爭，他說：為了革命利益共產黨人這時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在一次組織武裝起義失敗後，王維綱同志又被捕了，敵人對他施行了殘酷的刑法，用几根粗棍子把他壓昏了過去。但他絲毫沒有

等。他雖則是予取予求，唯我獨尊。他反對社會主義，對蘇聯就聯想到洋大人。這一切都是和我們新社會的思想在180°上對立。他是封建幽靈的代言人。他的思想是封建專制思想滲加上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成分。

奉送劉先生反正你的思想是退，抹也抹不美。

動搖，並鼓舞同時被捕的同志堅持鬥爭，他被河北偽高等法院判了死刑。王維綱同志進行上訴，轉到南京最高法院，這一轉就是一年。後來又進行第二次上訴，結果仍被判死刑。

在一次過堂上，敵人抓來了三個同志企圖對質，為了保存這三個同志的生命，王維綱同志堅決說不認識。為了讓王維綱同志逃走，外面的同志借探親的机会，將一把藏在鞋后跟的小鋼鋸送了進來。在一天下午，王維綱同志鋸斷了腳鍊，在被捕同志們的掩護下，大家巧妙的支開了看守，他從樓梯縫爬上了三樓，越牆跳進了隔壁煤球廠的一輛破汽車上，昏厥十分鐘後醒來，這時獄中的同志們還在唱歌，暗示敵人還未發現。王維綱同志迅速整理了一下衣服，鎮靜的走出了煤球廠，從西交民巷跑了出來。故事到這里，會場突然迸發出熱烈的掌聲，同學們都松了一口氣，為我們敬愛的主人公越出牢獄而慶幸。

王維綱同志最後說：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要坚持立場、不動搖，任何困難下，要有信心克服困難，要依靠黨和群眾的力量。他說：我們對敵人鬥爭必須堅決，因為敵人是無情的，是殘酷的。今天右派分子又向我們進攻，他們企圖誇大我們的缺點，否定整個革命成果，想叫共產黨下台。他希望同學們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不要被右派言論迷惑，堅決站穩立場，劃清思想界限。（紀一彙）

# 關於如何加強黨委對高等學校領導的一些意見

## 兼評劉景芳所謂“內行人治校”問題

政治教研組 李 濤

### (一)

應該如何治校，是此次整風運動中高等學校部分教授所提出討論的中心問題。討論中，關於治校形式，頗多議論：提“教授治校”者有之，提“民主辦校”者有之，提“內行人治校”者亦有之。總之，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雖然他們的提法各有不同，其所包羅的內容也不得一致，但是歸根結底，只不過是“內行人治校”而已。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必須指出：此次討論所涉及的問題，絕不局限於治校形式的本身，絕不局限於究竟要用某種形式較好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根本性質的問題，是要不要共產黨領導高等學校的問題。這就是問題討論的實質。

我認為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問題，是不應該提出來討論的。因為黨的領導，是中國歷史發展所決定的，是我國人民的根本大法——憲法——所規定的，同時由革命和建設的事實所證明了的。因此，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是天經地義的，無可動搖的。

如果說在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上還有值得討論的問題，那麼也只是討論如何加強其領導，絕不是什麼取消或削弱其領導的問題。

### (二)

人們又為什麼提出討論這一問題呢？問題的提出是否有其原因呢？

除了別有用心的分子，想借機取消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這一原因不談之外，我們承認，幾年來高等學校黨的個別組織和部分黨員，在工作上也暴露了一些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的集中表現，就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黨中央之所以提出整風，正是要糾正這“三大主義”。

黨員和個別黨組織的這些缺點表現何在呢？

首先，革命形勢的發展，任務之緊迫，與經驗能力未相適應，因而犯了主觀主義。

其次，辦高等學校，還不太內行，這使我們不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或不善於輕易相信一些人提出的某些問題，因而不恰當的處理了一些問題。

最後，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些問題。

這些缺點的產生，自有其社會歷史根源與認識的根源，我們不在這裡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有人說，任何人在工作中都不能不犯任何錯誤，而領導全國範圍的高等學校，對黨來說方在開始，為時不長，任務繁重，某些錯誤在所難免——這是正確的看法，這是我們能同意的。

但是，象某些人所說那樣，這只是由於共產黨領導所造成的結果，因而得出結論說，要減少或避免工作中的缺點就只有取消黨的領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而我們不同意的。

試問，有誰能說有缺點就應取消黨的領導呢？有誰敢說“內行人治校”就不犯錯誤？既然“內行人治校”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老實說交給“內行人治校”在根本路線上就必然會是錯誤的），那麼有什麼理由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呢？

正確的態度，正確的立場，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分析錯誤及其產生根源，從而幫助黨改正缺點，加強其領導，這才是同志的態度。相反的，如果象某些別有用心的分子那樣，拋開上述立場，借幫助黨整風之名，進行污蔑攻擊之實，企圖達到取消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之目的，不管他如何詭辯，如何善於縱橫排闔，攏絡人心，暗施鬼計，但是他總會被群眾所識破，所揭發。

### (三)

劉景芳提出了所謂“內行人治校”來代替黨的領導的謬論，他是在他惡意的對鋼院黨的領導攻擊、污蔑之後提出來的，五月卅一日教授座談會上，劉景芳在發言中說：“要求把學校交給內行人（教授、講師、助教），而不問是黨員或非黨員來辦……。”“反對黨委治校……”

在這段發言中，劉景芳一下子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他主張“內行人治校”，而所謂“內行人”者，即教授、講師、助教是也；其二，他干脆而明確的提出“反對黨委治校”。我們就逐一來分析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要看他所謂“內行人治校”問題，應先弄清幾個根本論點。

第一，什麼是“內行”。

這個問題，既可以抽象去研究，也可以具體去研究，為簡化問題起見，我們就以鋼院為對象去研究。

對象既是鋼院，那就應該以辦好鋼院所需要的內行去考慮。大家知道，鋼院是一所高等工業學校，其所培養的對象，是我國黑色冶金工業所需要的技術人員或專家。從這個觀點出發去考察內行，那只好說，唯有冶金專家才算辦好鋼院的內行，而其他人，則都屬外行，都不在也不能在辦好鋼院內行之列。

這樣劉景芳會出來鳴不平，“我們搞數學的應該放在什麼位置呢？”或者他會這樣指責：“這是你們的機械推論，吹毛求疵，是對我所謂內行的歪曲；誰說冶金專家才算辦好鋼院的內行呢？我所說的‘內行人’是包括教授、講師和助教在內的。”問題就在這裡。

的確，你所謂“內行人”者，是包括上述人等在內的。但是，為什麼你的“內行人”觀點偏偏如此狹隘呢？

照你对“內行人”劃定的範圍，人們就不禁要問：一方面教授等在忙於教學或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却無人做飯吃，這是否也可以辦好學校呢？為什麼只有教授等等才算辦好鋼院的內行，而行政人員就命定不能在“內行”當中佔一個位置，就不能在教授先生視野中佔一個位置？學生是我們的教學對象，為什麼他們就不該在“內行”之中佔一個位置？劉景芳先生，你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看到過象你所說的那種“缺腳”的學校呢？

“內行人”中既然根本沒有行政人員，那麼這些事情——人事、財政、總務和教務等——是否也要人來管呢？假如你不否認有這些事，那麼它該由那些“內行”去管呢？是教授抑或是講師？相信教授們絕不願也不應分心去處理這些問題，這是起碼的常識。在這點上，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劉仲容先生體會得比你全面，客觀得多。他說：現在的高等學校，象個小市政府，從吃飯、洗澡、理髮、住房到教學、科學研究、思想教育等都要管，這些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如果實行“教授治校”，“民主治校”，那就會把教授陷在行政事務工作中，是得不償失的。如何充分保證教授的教學，進行科學研究的時間，就要發生困難。（見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不難了解，辦托兒所、幼稚園，畢竟不是教授所內行的，在學校里，擔負行政責任的“頭兒”還是不可缺的。問題只在他們的工作有主要與次要而已。

劉景芳會說：在我所提到的校務委員會內是包括“職工”“學生”在內的。的確是這樣。但是這裡所討論的是“內行”問題，而你是把他們排斥在“內行人”範圍之外的。

由此可見，拋開了行政人員和學生，僅僅把“內行人”局限為教授、講師和助教，這不僅是一種偏激、片面之見，而且它本身也反映為另外一種宗派情緒。

第二，“治校”和“教學”，我們認為是有區別的。

劉景芳把“治校”內行規定為教授、講師和助教。就“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說來，他們應該算在內行里。可是我們這裡所說的是：“治校”，試問懂得某門專業，是否能說在“治校”方面一定也是內行呢？有的人盡可以在教授物理學上大顯身手，談到“治校”就不見得是內行。

“治校”和“教學”兩者固然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繫的。但就其性質、範圍和作用說來，二者還是多少有所區別的。就其工作性質說來，前者著重於全面行政領導，後者則側重於具體專業領導和技術性質。就其工作範圍說來，前者包括學校工作的一切重要方面，而後者一般局限於個別領域。就其工作作用說來，前者所考慮的著重於大政方針，原則計劃，組織領導，而後者則偏重於某一專業的具体領導和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如果這個區分沒有大錯，那就應該說，要辦好學校，除了專業教學知識之外，還必須有一套組織，發動群眾，提出大政方針的本領，劉景芳為什麼那樣輕視這點，適見其驕傲自大而已。

第三，內行是學來的。

照劉景芳的看法，內行似乎是天定的，是屬於某些人士所專有的。和你的看法完全相反，我們認為內行是學來的，由實踐學習，再實踐再學習，人們就可以由不懂到懂，由外行到內行。中國共產黨會革命，並不是先天帶來的。假如這些不被否認，那麼劉景芳有什麼理由判定鋼院的領導者們就永遠不能由“外行”到“內行”呢？

第四，他必須對鋼院幾年來的工作作正確地、客觀地、而不是成見的估計，這就必須說：“成績是基本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如果這種估計符合事實，那麼又有什麼理由不承認鋼院的領導者們多少還有點內行呢？

其次：劉景芳說：我“反對黨委治校”。這才是你所謂“內行人治校”問題的本質。“內行人治校”就是你用以代替黨領導的形式。

除了前述黨的領導是任何人無權動搖這一根本原則之外，我們還要對劉景芳“反對黨委治校”反動言論再予駁斥。

要知道：想辦好學校，是有愛國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所企求的。既然如此，他們就不能不把學校建設和整個國家建設聯在一起，也就不能不把學校前途和整個社會發展前途，同黨對它的領導聯繫在一起。沒有黨的領導怎麼會有社會主義前途呢？由此可見，那些主張把黨的領導排斥於高等學校之外的人們，他思想深處是肯定不喜歡社會主義的。

社會主義性質的大學，有其自己的發展方向和指導路線，所以這些問題的解決，除了黨的領導就是不可設想的。除了相信學校的性質改變，發展方向倒轉，不然人們為什麼要“反對黨委治校”呢？

社會主義性質的學校，培養的學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這個目的要想達到，就必須對學生加強政治思想領導和馬列主義教育，從這方面來說，離開黨的領導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見：反對黨委“治校”，企圖把領導權奪為己有的人，不僅其言論證明是十分荒謬，而且其立場也證明是反社會主義的。

劉景芳會起來詭辯：

第一、我所說的“內行人”並不排斥黨員。

第二、我還承認共產黨是領導，並且給它留了思想教育和監督輔助的工作位置。

第三、我不反對黨委領導本身，而只是反對這一形式。

看來還必須說明黨如何實現其領導的問題。

我們知道：黨是一個組織，一個集體。“內行人”包括了黨員，可是任何黨員個人都不能代表黨的組織。僅僅以黨員個人身分，而不是受黨委委託的黨代制，是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在任何場合、向任何組織提出大政方針、工作方案讓別人討論；而別人也不會承認他的意見是代表任何黨組織的。雖然黨的決定有賴於全體黨員帶動群眾說服群眾同自己一起去貫徹實施，但是黨的領導並不是通過隨便一個黨員去體現，而是通過黨委提出意見，交由它所委託的代表去體現，這才是“名正言順”的黨的領導。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的領導。

可見，“內行人”中雖有黨員，在他不是受黨委委託，不提出黨委意見時，個別黨員不能實現這種領導，從而黨的領導只不過是空談。

黨的領導主要表現在對大政方針等重大問題的提出，同時也表現在政治思想領導工作和保證工作上。但是，如果沒有黨委組織，或者空有黨委組織而不把它放在領導地位上，那麼它就不能提出大政方針，從而政治思想工作就是架空的，不能兌現的。因為政治思想工作和保證工作，是不能脫離整個學校的發展而獨立存在的。

可見，抽象“承認”黨的領導，而不給以應有的地位，這種所謂承認不能不說是虛偽的。

至於說到反對黨委領導形式，那麼，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容和形式，不存在沒有內容的形式，也不存在沒有形式的內容。形式和內容是辯證統一的、不可分割的。

黨委是一種領導形式，它是由許多成員組成的；沒有許多委員組成的形式，就不會有由他們討論提出的方針、政策和計劃等等，沒有黨委領導這一形式，它的內容就不存在。

可見，否定“黨委領導形式”的說法，就是否定黨的領導。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管人民提出如何動聽的名稱或形式，只是要他在這一

(下轉第四版)

坚决和右派的思想言論作斗争

楊尚灼

我院整风运动开展以后，逐步深入，群众对领导和许多党员提出了很多意见，整风办公室也及时的处理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問題，更复杂更难解决的问题，当然有待于詳細的調查研究；而更广泛更重大的問題还有待于大家来进一步揭发和討論。据我个人看来，运动是健康的在进行着。在性急的同志看来，可能觉得运动进行得太慢，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有右傾思想的人們就抓着这个机会来大放厥辞，危言聳听：說党委对整风沒有决心啦！說高院長“孤掌難鳴”啦，說許多教授都要离校啦！甚至于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醜化誣蔑我院党委和党中央，把鋼院描写成“封建統治，添黑一團，只能培养乱臣贼子”，（怎能培养出工程师？）

試問这样的言論，能培养我們师生員工的自尊心嗎？能使我們更团结在党的周圍嗎？能使我們相信党的領導嗎？能使我們同学安心学习嗎？能使社会上信任我們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嗎？如果不能，那么，这种言論对建設社会主义有利嗎？对党的領導有利嗎？如果不，那这种言論很明显的就是右派言論。

右派分子惟恐天下不乱利用我們一些缺点，来否定一切。他們說党的領導是三害的根源；說我們学习苏联，全是教条主义，这完全不合事实。他們用好听的名詞——民主自由来迷惑我們，實質上他們向往的是資本主义的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对我们的事业有极大的危害性。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欢迎这些荒謬的右派言論，想借此离間我們内部团结，搞垮我們。我們必須提高警惕，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存在。不能幻想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还能保持今天的美好生活。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經不是脖子上只有一条鎖鏈其他一无所有的人們；那时候任何改革对于他們没有什么損失。今天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掌握了一切生产資料，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对任何改革必須好好考虑对我们的事业有利还是有害，不能无原則的欢迎任何惟恐天下不乱的改革。

右派的思想言論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坚决地站在师生員工一起，对右派的思想言論作无情的斗争，非把它和毒草一样連根鏟去不止。

向趙錫霖教授提點意見

相61.3 莽明

現在全院师生員工都处在轟轟烈烈“声討右派言論”的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也已經开始整风，在这火热的斗争中，在几千人的会場中却找不到民盟鋼院負責人——趙錫霖教授。

回想整风开始时，趙錫霖在西飯厅对肃反問題的估价作了长篇“动人”的演說，博得听众“久而不息”的掌声。因为我当时有事，沒有参加，会后听同学談論，好些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甚至气愤。

例如：他說肃反在理論上受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在路上線是錯誤的。又說“被斗”的同学們，你們气量要大些，冷靜些，因为斗你們的同学是由于上級的鞭策、佈置。

显然依趙教授的意見，肃反是完全錯誤的，錯誤也應該向党中央、毛主席去“算賬”，而后面一句話显而易见，起了煽动的作用。

因为我沒有亲自听，不想批駁其他論点，現在我想对趙教授在5月25日教授座談会上的发言中某些論点表示自己的看法。

1、趙教授說党領導对解决众所週知的党内小宗派、小集团（从教学、行政、人事一直到压制学生的宗派把頭）……“决心”到什么程度？——我不明白趙教授根据什么說党内有“小集团”，“宗派把頭”。

2、趙教授說：高等学校，應該是講道德、學問、文化、修养、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三害办事处，升官发财，欺上瞞下，吹牛拍馬，耍把戏，弄手段，投机取巧，販賣學問的地方。看看別的国家高等学校啥样，我們啥样，令人痛心。墨子曰，“入国不見其土，則国亡矣”。我們入院不見其土，則院亡矣。

我們承認学校存在一定缺点，但經過趙教授輕筆一揮，竟把我們这全國聞名的鋼鉄学院說得既不如旧社会的“官場”，更不如“賭場”，我不知趙教授為何要把学校画上这幅醜相。

“入院不見其土，則院亡矣”，难道我院

这么多辛勤培养下一代的有名教授不是“士”？所有敬爱的老师、員工不是“士”？几年来我們在荒地上由于党委与全体老师的努力建成鋼鉄学院，並取得旧社会几千年来夢想不到的成就，而趙教授却說“院亡矣”。实在令人費解！既然趙教授精通各国治校方法，如何在“治校問題辯論会”上不发表意見，而在台下旁听呢？我更不知道趙教授指的是那些国家。

3、趙教授說：鋼院宗派主义所以严重，……鋼院还有一特点，即“当仁不让”之士少了些，而“歌功頌德，获益非淺”的多了些。我想这段話明明是对我們敬爱的教授与老师們的評價。

我是一年級学生，对学校了解不多，但在我所接触的教授与老师中几乎都是“当仁不让，教人不倦”之士。我們由衷感激热爱我們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而辛勤教导我們的老师。趙先生却把他們看成“歌功頌德，获益非淺”。似乎趙教授太不尊重我們的老师了，客觀上也起了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的效果。

4、趙教授說：令人伤心的是鋼院有些党员竟以拍馬过活，如过大烟癮，一日不吸，四肢不舒。

我在大字报上看到鋼院有些党员是有严重的缺点，但决不相信鋼院竟有趙教授笔下之党员。最好說得具体些，讓我們去調查，調查。而且“些”字不但表示个别的，而且表示一大部分，显然趙教授是无中生有，是夸大了。

5、趙教授說：想走的不少。我个人即其中之一。趙教授也不叙述誰要走，走的原因。在整风开始說这些莫名其妙的話，引起了我們全校騷动，似乎“危机”临头，說这些話的意图总是令人莫测。

6、关于鋼院民主党派，趙教授說是“听话訓練所”，“念念經”。我更不了解这些，我想盟員的老师們是不会接受这些評價吧！趙教授在发言中，口口声声“推心置腹”实际发言内容表现却很少，我为了帮助盟内整风，追求真理，說了这些。

讀劉寶智先生的文章

德義

刘宝智先生在62期院刊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无怪乎人家都說：“党原来是老虎皮，只要参加过党，就可耀武揚威，說可以江山是老子打的，应当享受一点。不管是否能做事，就凭这一点，吃喝就不尽了。”……”

附註中說：“当时气愤憤胸，急不擇言，今天看来若干語句，不太通順，也有不能完全表达原意之处，例如“党原来是老虎皮”，是党员把党当作老虎皮，护身披”。

文章結尾又說：“我的意思是党员把党当作老虎皮，护身披，披上了党的招牌，就可以任意欺人”。

看到这些话万不能同意。估且不去追究刘先生是否当时真是因气愤憤胸，急不擇言，而誤写了。但是事实上是否真如先生所說的，我們的党员都是因为把党看成是老虎皮，披上了它就可以任意欺人，就可以耀武揚威，就应当享受，就吃喝不尽了，才入党的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党也就必然是一张老虎皮了，那么刘先生又何必来个校正呢？岂不多此一舉！我想就連三岁小孩也会給与否定的回答。可是刘先生还滿有把握的說：“无怪乎人們都說……”难道果真是人們都这样說嗎？我想决不是，那么刘先生为什么还要假借大家的名义呢？恐怕只有刘先生才这样說吧！

把党员看成是“披上党的招牌，就可以侮辱人”，把党說成是“老虎皮”，难道这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不是，那么就是想借整风之机进行污蔑和攻击我們的党吧！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請刘先生自己才能正确地回答吧？

这是什麼立場？

許秀

刘景芳教授自命为貧而不諛，可杀而不可辱，可作“友”而不甘为“奴”的大丈夫。並把自己比作岳飞、史可法。

岳飞等人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他們为民族的生存，抵禦外侮，以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刘教授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为了吃飯，竟在日本佔領下的大學里服务，这有什么民族气节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統治时期，刘教授又和国民党反动派勾勾搭搭，並在国民党特务的掩护机关服务，还无耻地要求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朱家驊提拔提拔，以致在朱家

驊、陈誠等国民党特务头子看来，刘教授是一位“忠貞”教授。这是貧而不諛，不甘为“奴”嗎？不，这表现了刘教授死心塌地，愿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一付十足“奴才相”。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仍給予刘教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而刘教授呢？却一直站在党和人民的敌对立場。他污蔑苏联專家为“洋大人”，向苏联学习是“崇苏”。他辱罵共产党，說老党员有70—80%城市化了，腐化了，而新党员呢？就更糟了，即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今天的共产党员都是一些无才无德的人，只知做“官”、“循私”、“享乐”。共产党在高等学校里是培养“一堆失去‘自尊心’搖旗呐喊的喽囉，至高也不过培养一些只能輔助別人作皇帝的‘乱臣贼子’”。在这里他隱隱地把人民敬爱的領袖毛主席比作封建統治的皇帝，把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青年学生当作“喽囉”，“乱臣贼子”。他还把接近共产党的人痛罵一通，把这些人說成是“报耳神”，是一批“拍馬奉承”，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无耻之徒。他公开表示“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党委治校政策和制度，並要求党把高等学校交給象他这样的在‘学术界有相当地位’的所謂‘內行人’，……等等”。

总而言之，刘教授置身于人民之外，把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友”，並甘心为“奴”。而視人民視党为“敌”，不甘作人民之“奴”。难道岳飞、史可法等人是如此的嗎？难道今天中国大多数的知識份子是这样的嗎？魯迅先生說得好：“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有民族气节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尊心”。而刘教授的“自尊心”是什么呢？刘教授是站在什麼階級立場？显然不是人民的立場，而是人民的敌人的立場。

到底他們要不要社会主义？

源漁

甲：喂！朋友！我想問你一个问题，当大多数人都在和右派坚决斗争的时候，而卻有不小的一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他們到底要不要社会主义？！

乙：除了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他們絕大多数都是要社会主义的。

甲：那么这当中就有问题，既然你說他們都要社会主义，为什么他們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却不是那么仇恨，积极与之斗争呢？他們对批判院內的右派言論决心不大，甚至有些同情；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关心。看小說、下棋、睡覺来消磨時間。开会时沒精打采，一言不发；甚至有的对延長時間很反感，这些又作何解釋呢？难道他們都是象你說的那样要社会主义嗎？

乙：是的，他們是要社会主义的，依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們对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認識不足。忘記了这是一场尖銳的階級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誰战胜誰的問題；他們也忘記了自己的立場和責任。他們很麻痺，还没有意識到或者还不相信右派分子其目的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自己的好心腸来衡量別人。另外，他們都是一些知識分子，虽然經過了思想改造，但有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和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资产阶级思想尚未彻底清除。加以他們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使得他們斗争不坚决。

甲：你說得还有点道理，社会主义是不会凭空而来，她要我們去建設，更需要我們去保卫。那么这些人應該怎么办呢？

乙：这很简单，只要他首先坚定无产阶级立場檢查一下自己的感情，仔細地学习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明确这次斗争的性質。他們自然会积极起来和群众一起投入战斗的。

甲：他們每个人都能这样嗎？

乙：当然这要看他們每个人是否愿意这样作。

甲：我們倆昨天不是就要表示我們的决心嗎？是否这里順便談一下呢？

乙：很好，我們写下来吧！

一、在延期学习期間，一定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二、我們可以不要假期，但坚决要社会主义。

三、要在这次斗争中来鍛鍊自己，提高自己。

甲、乙：假若我倆的决心能成为全院师生員工的决心，那我們就一定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在这次决定性的战斗中，无产阶级思想一定取得胜利。

###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評劉景芳先生向黨的進攻  
黃務濂

大家都談到劉景芳先生的發言，我對劉先生的兩次發言一直是儘量往好處想的，但願真正是“細雨點點入心田，和風習習吹滿地”，但是根據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標準，仔細讀讀劉先生的發言，的確使人十分失望。

對劉先生的發言，決不斷章取義，否則就真以為劉先生是對黨忠心耿耿了，劉先生是有學問的人，說出來的話是令人頗費腦筋的。但有了毛主席指出六條標準，問題也就容易得多了。

劉先生的發言很系統，很完整，很全面，幾乎否定了黨的一切，把黨的工作，黨的幹部，黨員以至擁護黨的群眾醜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里我只談三個問題：

#### 一、歪曲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講話

說“毛主席把整風說得象吹皺一池春水那樣輕鬆愉快”，而“我們大家還是要嚴肅認真地來整風……”。如此說來，毛主席對整風倒不如劉先生嚴肅認真，真是天知道！這里應該指出：毛主席這句話是在談到匈牙利事件對我國的影響時說的，而並非指整風，想不到劉先生這樣的數學家倒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

劉先生說：“國人皆曰有墻，而彭真獨曰無。這里暫不說，劉先生是否歪曲了原意？但這句話意思至少是說明了彭真和“國人”不一致。那麼“國人”當然就應該起來反對彭真了。

#### 二、“主宗官”與“祖宗官”問題

劉先生關於主宗官的道理是一套完整的，充滿“創造性”的理論，決非失口之言或一時偏激之語。雖然劉先生的確揭發了許多工作中的缺點，但似乎是要連雞帶水一起倒掉。好像是發現了某人身上有髒東西，但不是幫他洗澡，而是連肉一起割掉。劉先生筆下的鋼院是漆黑一團，的祖宗官集團，是人間地獄，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體”而肅反運動可以看成是“祖宗官”的領導者借此機會把他們不順眼的人來個一掃光，以便更穩固地當官，實行封建統治，以便作威作福”。而鋼院所培養的人材“不過是一堆搖旗吶喊的嘍囉，至高也過不過輔助別人作皇帝的‘亂臣賊子’。一向號稱熱心培養青年的劉先生，僅能如此毒惡地污蔑自己的學生，真令人十分傷心！

劉先生認為主宗官的根源是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對知識分子不信任，“不懂馬列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易于坏事，就是那點知識也沒啥了不起……”，不過因為黨的人力不足才利用利用，才把黨員“合計合計”後，“安插”到高等學校來。這個根挖得真不淺，這一挖，連中共中央也割掉了，難怪劉先生一開始就給毛主席和彭真同志來這一棍。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是我們同志親身體會的，特別是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總理作了報告以後更為具體，黨一向對知識分子是團結和改造。毛主席於1939年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這就是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信任。在同一篇文章里毛主席又說：“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吸收入黨，對不能入黨或不愿入黨的一部份知識份子也應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由此可見，也不是解放後才“合計合計”的。

#### 三、劉先生向黨的進攻

劉先生對我院幾位黨員幹部進行了毒惡的人身攻擊，說魏院長是“驕傲自滿兼自私，營私舞弊”，張院長是“十足的小官兒作風”什麼“官象”和“嘴臉”把這些同志說得卑鄙惡毒，一文不值，使他們無法在群眾面前站起來，使群眾不敢信任他們。這是幫助他們克服缺點嗎？事實上已使有些青年同志不明真象的同志搞得稀里糊塗！有的同學和魏院長開過一次座談後說：“魏院長原來並不是那樣壞”。

劉先生說：我們認為對高級知識分子疑則不用、用則不疑，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們也要當家作主，也要做新社會的主人”。

儲安平說：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

同志們！我不知道，這是否叫做共同的語言？和許多右派言論一樣，劉先生把積極份子

說成是“善于推測領導意圖，吹拍奉承，看風行事，好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劉先生所說的某位“被領導所捧的當系主任的人物”，當然也難逃此污蔑之列，劉先生深知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最鄙棄吹拍奉承，有高度的正義感和應有的自尊心，劉先生看准了這點猛烈一擊，以後誰還靠近黨呢？高等學校中的知識份子都離開了黨，這種客觀效果比葛佩奇喊殺共產黨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劉先生在發言中苦費思索地用俚了刻薄挖苦而又莫稜兩可的詞句，既易博得同情，又容易翻案改口，既好像是只說鋼院，又似乎在說全國，好在劉先生自己總結了一下；他說：“我認為鋼院的黨群關係不但不正常，而且相當惡劣，黨的領導方式沒有走出地下黨，土改和抗日時期的圈子，落后於時代的發展，可能全國都是如此”。真是一語道破，劉先生的矛頭並非僅僅指向鋼院，難怪劉先生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制，而且抗議院刊發表。

同志們！綜上所述，這樣的黨還算什麼黨呢？豈不是比國民黨還壞嗎？這還怎麼能整風呢？這樣的黨人民不是應該群起而反之嗎？劉先生的確是從右派分子那里找到了共同語言，劉先生是看“參考消息”的人，這些言論究竟受到誰的鼓掌歡迎呢？劉先生從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人一下子變得這樣刻骨仇恨，這可以解釋成“一時沖動”和“偏激”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敬請劉先生深刻地檢查一下。

### 情緒問題，還是立場問題？

(相59.3班討論記錄，王緒、馬忠聲整理)

六月廿六日大會上，劉景芳先生在為自己辯解時，只能說出一個理由：心理有什麼說什麼，情緒重，語氣重了。但是再看一看他的發言全文，就會感到這些話是掩蓋不了他的實質的，簡直是無理的取鬧，把自己的“心理話”作一翻使人感到極為幼稚的辯解，這樣就更在大家面前暴露了其兩面派的手法及面孔。

劉景芳先生有沒有情緒呢？有的。但本質上是立場問題。他對黨的領導、肅反運動、黨的幹部政策……等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的，顯然他不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而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對黨領導的立場上來講話，在這一立場上拿出了自己的“心肝”，他的情緒是由這一立場決定的。因此這些話就不是情

(上接第二版)

緒問題，而是根本的立場問題了。分析了劉先生的言行不難看出，他是別有用心。醜化黨的領導，醜化積極分子，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要求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而要有學術地位的人作院長，他問全院同學有多少人，力量大不大，有事先和他商量……等，顯然這些完全是他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的立場所決定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可是有的人說：劉先生肅反被“斗”，有情緒，所以講了這些話，你不了解他的心情。我們說，不然，根本立場問題是不能忘記的。有些同學在肅反時被追查或批判錯了，他們有了情緒，認為肅反的成績和缺點那一個是主要的這一問題是值得研究，這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當組織上向他們解釋清楚並道歉後，他們有了較明確的認識，感到組織上那樣做是從社會主義利益出發的，今天組織承認了錯誤，也就不計較了，應該積極的投入反擊右派的鬥爭中來，而不應作右派的“情緒”支持者，這些同志與劉先生是根本不同的，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不是在根本上或一系列的問題上懷疑黨的領導和工作成績，而是個別的、暫時的情緒問題。在階級鬥爭中，他們會認清是非，消除情緒，這些同志是好同志。可是還有少數的人不能認清這一點，一口咬定“情緒”不放，這就難理解了。根本立場問題和情緒問題混在一起，結果弄得敵我不分，是非不清，而在向右派反擊時，他們觀望，甚致包庇右派言論及右派分子，這是很危險的。這樣會動搖或根本改變他們的階級立場，而由於情緒會發展到否定一切的、根本立場的錯誤道路上去。因此我們希望這樣的同志從根本問題上想一想，快清醒過來。

由上所述，可以說：站在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情緒，即立場決定情緒。但站在這一立場亦可能在暫時或局部的有不同于這一立場的情緒，這樣就有兩個可能：一個是立場克服了情緒，使立場更穩定，另一可能就是情緒推翻了原來的立場，而引起根本立場的變化，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尤其是政治經驗不足的青年人更應警惕這一點！

最後我們說：劉先生的發言實質是根本立場問題，情緒是由他的立場所決定的，所以在分析是否是右派時，必須先從“立場”這一問題着手，任何用情緒作擋箭牌來迷惑群眾的企圖都是妄廢心機的！

更正：89期刊登載的余瀋陽的：“從‘不許侮辱教授’談起”一文中①“共產黨的道德”應改為“共產主義道德”②“佔領地盤”，應更正為“佔領地盤”。

四、黨委對委員會是領導關係，它通過黨委代表提出意見，實現其領導。（前已說過）此外，應設學術研究機構。成員可選舉產生。它受院長領導。是全院最高學術研究機構。

上述權利機構和研究機構一經組成後，則應由各該機構自行擬定議事、集會等規章規則，作為其活動之准繩。

其次，為了使民主形式真正發揮作用，應建立相應制度以資保證。這些制度即會議、匯報制度，工作檢查制度，工作總結、報告制度。

利用這些制度，檢查工作，改正缺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並把學校工作放在全院教、職、學員監督之下。

最後，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並不是萬能的。無論怎樣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犯嚴重錯誤。有了正確制度以後，主要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此，我們提出：

一、院領導和黨委領導同志必須想盡辦法，積極學習，要求在一定時間內掌握一門專業，使自己由“外行”到內行，求得少作主觀主義和不切合實際的決定，順利進行工作。

二、認真改變工作作風，深入聯繫群眾，特別是老教授。吸取其意見，了解其要求，在工作上給予應有的支持和尊重。凡是可行的意見，應是及時採納與行動。凡屬正確意見，而一时无力實行者，應記錄在案；便于以後採用。不可行者，亦及時解釋說明。絕不應把深入工作當作形式，把聽來的意見不作交代，這樣會損害群眾的責任感與積極性，會堵塞言路，造成黨群隔閡。把聯繫群眾變為經常性質，建立接待群眾制度，與老教授晤談制度。

以上是我們對黨委應如何治校粗淺見解。由於閱歷不多，經驗有限，水平不高，所提問題不妥、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請同志們指正。